

上海市重点图书

胡雲翼集

# 胡雲翼

胡雲翼 选注  
刘永翔 编  
李露蕾

HUYUNYI XUANJI

# 选词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胡雲翼集

# 胡雲翼选词



词选·宋词选

胡雲翼 选注  
刘永翔 李露蕾 编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胡雲翼选词/胡雲翼选注. - 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4.2

ISBN 7-5617-3664-9

I. 胡… II. 胡… III. 词(文学)-作品集-中国-古代 IV. I222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008776号

胡雲翼集

### 胡雲翼选词

——词选·宋词选——

选注 胡雲翼  
编者 刘永翔 李露蕾  
责任编辑 刘凌  
责任校对 陈锦文  
封面设计 黄惠敏  
版式设计 蒋克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
市场部 电话 021-62865537  
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  
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

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-62232873  
华东 中南地区 021-62458734  
华北 东北地区 021-62571961  
西南 西北地区 021-62232893

业务传真 021-62860410 626023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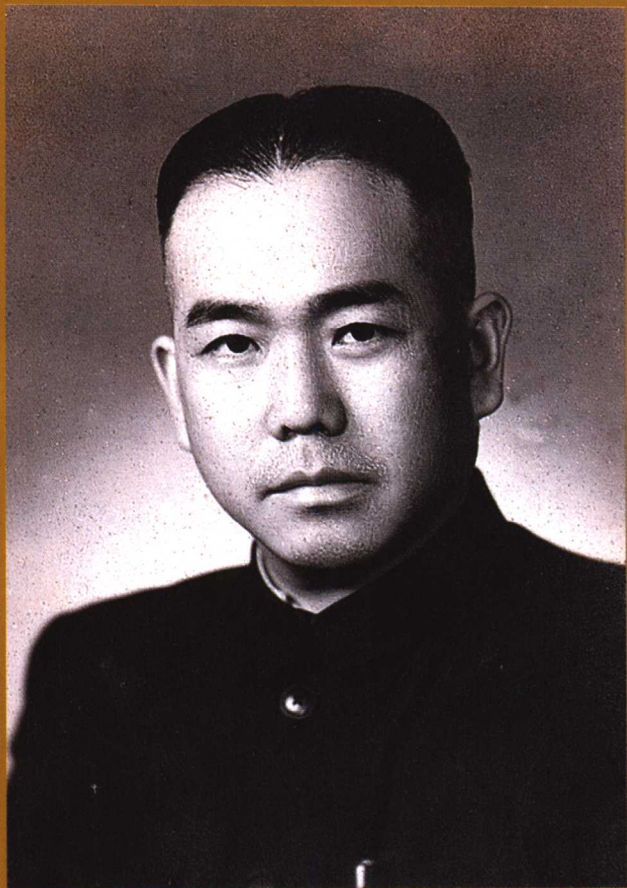
http: //www.ecnupress.com.cn

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 
邮编 200062

印刷者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 
开本 890×1240 32开  
印张 16.5  
字数 434千字  
版次 2004年9月第一版  
印次 2004年9月第一次  
印数 3100  
书号 ISBN 7-5617-3664-9/I·293  
定价 29.80元

出版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联系)



胡雲翼先生  
(一九四六年于浙江嘉兴)



胡雲翼先生与夫人许映如、公子胡光棣  
(一九五四年于杭州西湖)





胡雲翼先生为上海师范大学  
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奠定坚实基础

詞是唐朝興起來的一種新的文學樣式，它的興起跟音樂的繁榮密切地結合着，和樂府詩的性质基本上是相同的。因此，前人探討詞的起源往往溯及于古代的樂府。從形式上看，南朝樂府是某些長短句的歌辭，如蕭衍、蕭統、沈約寫的《江南弄》十四首，一律都是四七言相雜的定句、定字，隋朝楊廣、王胄寫的《紀述東》四首，更接近詞的形式格律。但是我們認為，詞之所以成爲一種新興的文体，還是有它自己發生、發展的一條歷史綫索，和樂府詩混同起來講，不能說明問題。宋人王灼《碧雞漫志》說：

蓋隋以來，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，至唐初盛。今則繁聲淫奏，殆不可數。這所謂「曲子」賦曲是指隋、唐時期流行的西域音樂——燕樂（即宴樂），那是代表西北民族剛健風格的新音樂，和中國原有的清樂有所不同。這兩種体系和性質不同的音樂配合着不同的歌辭形式。曲子<sub>辭</sub>是用來配合燕樂的。詞，是這種新起的曲子詞的簡稱。

曲子詞首先盛行于民間。根據敦煌詞的有



山中白雲詞卷二

西秦玉川生張炎叔夏著

臺城路

寄姚江太白山人陳文卿

別本文卿  
作又新

薛濤牋上相思字重開  
又還重摺載酒船空眠波  
柳老一縷離痕難折  
虛沙動月嘆千里悲歌唾壺  
敲缺却說巴山此時懷抱  
那時節寒香深處話  
別病來渾瘦損懶賦情切  
太白閒雲新豐舊雨多  
少英遊消歇回潮似咽  
送一點秋一作愁心故人天





歲在戊午  
閏三月廿  
開國為  
其翁摩  
傳神標  
記

〔清〕釋大汕《迦陵填词图》（乾隆刻本）



## 前 言


胡雲翼先生(1906—1965)以词学闻名于世,而实际上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。早在湖北武昌高等师范学堂读书时,即与刘大杰、贺扬灵合称“武汉三才子”,以文学创作与古典文学研究露其头角、耀其才华,直至展其雲翼,可谓内美修能,名副其实(先生原名耀华,后改雲翼)。

先生对于中国文学有全面的了解,词学以外,所撰有《唐诗研究》(1930)、《新著中国文学史》(1932)、《宋诗研究》(1935)、《唐代的战争文学》(1937),而词学则是先生数十年寝馈其中,最具心得与特色,也是最有影响的学问。

先生的词学受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胡適三先生沾溉最深,王国维推崇北宋词、标举“境界说”;梁启超喜爱“奔迸”、“回荡”的辛弃疾词;胡適则赞美白话词,贬斥“词匠”词。读先生所著《宋词研究》(1925)、《词学ABC》(1930)、《中国词史略》(1933),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出其渊源所自。而在建国后出版的《〈宋词选〉前言》中,先生将明张綖、清王士禛以来分词体、词派为“婉约”、“豪放”的提法充类至尽,把“高举爱国主义旗帜”之词定为主流,而把“代表南宋士大夫消极思想和个人享乐思想”之词定为逆流,并以此为标准对宋词作了评选,也正缘此,词学界尊体派一些学人在先生身后颇有微词。

“顺逆”之说用的是斗争哲学的术语,如今不免触目刺耳,想先生当时内心亦未必以此为然,不过以“左”的词藻加以文饰而已。但是,重“豪放”、轻“婉约”,却的确是先生平生一以贯之的词学思想。





《宋词研究》是先生的少作，也是词学史上第一部系统全面研究宋词的专著，问世早于刘毓盘《词史》（1930）五年、王易《词曲史》（1932）及吴梅《词学通论》（1932）七年。正是在这部著作中，先生指出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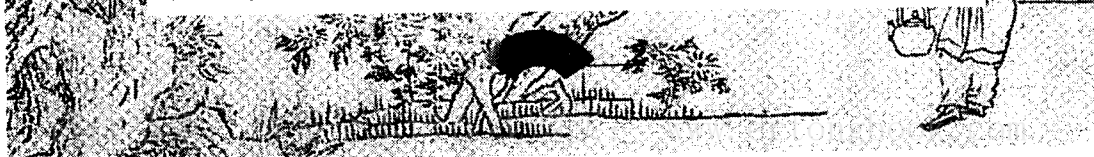
据我们看来，苏轼一派的词，打破了词为艳科的狭义，新辟无穷的词境，让新作家去努力。革命的伟迹不小。无奈一般人只囿于词以婉约为宗，不向新境界图发展（苏轼以后直至南宋，才有辛弃疾继起），反肆意讥笑革命军，而刻意求古，这才是食古不化呢<sup>①</sup>！


清真词之铺叙，未必高出淮海。居然有人称他是北宋第一词家，未免过誉了吧<sup>②</sup>。

姜夔……即如他最有名的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，那是姜夔的自度腔，在词史是两首极有名的词。但在我们看来，也未见得好到怎样。艺术确是不差，典故也用得很巧，可以说得上“清空”二字。可是没有内容，没有情感，引不起读者心弦的感应，真是读了等于不读一样，这是坏的方面讲<sup>③</sup>。

实在，宋末的词已经变到无可变了。所谓词家作词，也只是在旧词里面换字斟句，转来转去，并无新意，值不得我们加意来叙述<sup>④</sup>。

这些观点是直至先生操《宋词选》（1962）选政时均未改变的。当然，变化还是有的，而且还是大的。如《宋词研究》认为将宋代词人分为豪放、婉约二派不妥，“辛弃疾、苏东坡有豪放的词，也有婉约的词，一切词人都是如此。在这里，我们既然不能说某一个词家属于某派，则这种分派便没有意义了”<sup>⑤</sup>。这不由使我们想起了施蛰存、吴世昌二先生在“文革”后提出的同样的观点，原来先生早就智珠在握了，但是在《〈宋词选〉前言》里，却又分明标举以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与姜夔为首的婉约派的对立。又如在《宋词研究》、《词学概论》






(初版原名《词学ABC》，收录于《ABC丛书》)、《中国词史略》、《新著中国文学史》中，先生对李清照、朱敦儒二家略无间言，而在《宋词选》中却不乏贬辞。他指摘易安《词论》否定诗词合流的形式主义倾向，言其词作“内容和诗歌所表现的爱国主义思想相形见绌”，“有不少的词在渲染愁情上尽其能事，难于确指其内涵的现实意义，而且情调过分低沉，这给读者不免要带来一些消极因素”<sup>⑥</sup>。又批评朱氏《樵歌》“有很大一部分反映闲适的生活，严重地脱离现实”，“在思想感情里削掉了‘憎爱’，作品里便不会再有家国之感，剩下的便只有风月了”<sup>⑦</sup>。前后异撰，其故何耶？想来必是和钱锺书先生作《宋诗选注》时那样，“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”，“企图识时务、守规矩”而不得不然吧<sup>⑧</sup>，实非出于先生本意。联想到拨乱反正后提出不同意见的词学研究者，他们在当时也只能噤不发声，不提异议，对此我们能够体谅，那么，对于同样是一介书生的雲翼先生，我们难道就不能用《春秋》的“原心”之法吗？

实际上，不但对于非出个人肺腑而迫于压力而发之言当原其心，对于实出其人本心之语亦当抱有同情的理解，即所谓“知人论世”是也。

先生重“豪放”、轻“婉约”词学观点的形成，是与他的时代和阅历密不可分的。先生少时目睹身经中国的积弱积贫、列强侵略，早萌救国复兴之志，曾亲身投入抗日战争。加上受新文化运动影响，痛时人之麻木，而产生改造国民性的强烈愿望。且听他在《唐代的战争文学》末尾所抒发的那一番慷慨激昂之言吧：

尤其现在的中国，我们能够非战吗？五卅惨案发生了，巡捕开枪击杀华人了，外国军舰已经包围上海了，日军乘机潜入南满了，帝国主义不断的向我们进攻，我们能够非战吗？江浙的战事未已，广东的战事未已，东北的战争又爆发了，鲁豫的战事又爆发了，土匪到处掠劫了，水深火热的内乱没有已时，我们能够非战吗？本来酷爱和平，已铸成中国人的特性，何待鼓吹非战？况且中华民族经过儒教、道教、佛学、理学等东方文化几千年不断






的渲染,已经变成卑弱的、无抵抗的、亡国的国民性了。我们现在正应该鼓吹尚武奋勇的猛烈精神,唤醒伟大民族的灵魂,为正义而作战,为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而作战,为祖国的生存与福利而作战,为世界永久的和平而作战。我们所需要的,是革命的、主战的文学,我们应该反对卑怯的非战文学,反对那妨害国民性的鼓吹非战思想的文学<sup>⑨</sup>。

在《词学概论》中,先生论苏轼词时又说:

我们则认定这种“别派”,是词体的新生命。这种新词体离开了百馀年来都是这样温柔绮靡的旧墟,而走上一条雄壮奔放的新路。这条路可以使我们鼓舞,可以使我们兴奋,而不是叫我们昏醉在红灯绿酒底下的“靡靡之音”<sup>⑩</sup>。




这不禁使我们想起明末陈子龙反对公安派的“韵趣”和竟陵派的“幽峭”,认为是一种“亡国之音”,而提倡雄浑高亮的前后七子之诗<sup>⑪</sup>;又梁启超称赞陆游诗时所说的“诗界千年靡靡风,兵魂销尽国魂空”<sup>⑫</sup>。一古一今两位前辈,其议论与先生的逻辑若合符节。可见国难当头的形势使忧国之士对文章的风格舍婉约而取雄浑,乃是一种必然的趋势。

现在略谈一下本人对先生最负盛名的著述《宋词选》的看法。此选可与先生少作《词选》(亚细亚书局1933年版)的宋代部分相较。在其书序中,先生指出:

我认定朱祖谋先生的过于重视传统的古典主义,特别赏识吴文英一派的词,和胡适先生的唯白话是崇主义,专门赏识朱敦儒一派的词,都不是健全的主张。

我认为吴文英固然有许多好词,亦未尝没有坏词;朱敦儒派固然有许多好词,亦未尝没有坏词。总之,任何作家的作品的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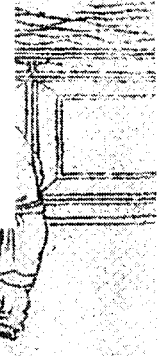


坏,决不能因其作风偏于古典或俚俗而予以整个的优或劣的批判。


这番话公允之极。我们注意到先生不唯权威马首是瞻,已不以胡适凡白话词皆好的观点为然了。据《词选》自序,该书所选之词,“都是我向来所喜欢诵读的精粹的作品”,可见足以代表先生的真实喜好。而《宋词选》中所选,就不免有受意识形态摆布的因素了。我们不妨将二选作一比较,看一看两者所收“豪放派”词与“婉约派”词数量上的消长。

《词选》收宋词 533 首,而《宋词选》收词 296 首,前者较后者多出 80%。先看“豪放派”:苏词,《词选》收 16 首,占 3.0%,《宋词选》收 23 首,占 7.8%;辛词,《词选》收 25 首,占 4.7%,《宋词选》收 40 首,占 14%;陈亮词,《词选》收 1 首,占 0.2%,《宋词选》收 4 首,占 1.4%;刘过词,《词选》收 4 首,占 0.8%,《宋词选》收 6 首,占 2.0%;张孝祥,《词选》收 4 首,占 0.8%,《宋词选》收 8 首,占 2.7%。无论是绝对数量与相对比例都大大提高。再看“婉约派”:晏殊,《词选》收 11 首,占 2.1%,《宋词选》收 5 首,占 1.7%;张先,《词选》收 15 首,占 2.8%,《宋词选》收 3 首,占 1.0%;晏几道,《词选》收 11 首,占 2.1%,《宋词选》收 5 首,占 1.7%;晏幾道,《词选》收 13 首,占 2.4%,《宋词选》收 4 首,占 1.4%;秦观,《词选》收 21 首,占 3.9%,《宋词选》收 6 首,占 2.0%;史达祖,《词选》收 10 首,占 1.9%,《宋词选》收 2 首,占 0.7%;周密,《词选》收 7 首,占 1.3%,《宋词选》收 1 首,占 0.3%;张炎,《词选》收 15 首,占 2.8%,《宋词选》收 5 首,占 1.7%。无论是绝对数量与相对比例都大大降低。其故何在,不须词费!

两相比较,我们不能不得出《宋词选》中所收的好些作品非先生真赏所在的结论,而《词选》虽作于早年,却“少作精严故不磨”,首首皆出于先生的量才玉尺;《宋词选》虽出于暮齿,却不足以成为先生的“晚年定论”。据夏承焘先生《天风阁学词日记》记载,先生曾与夏公多次商讨《宋词选》事;可推其中必然参考了夏公的意见。夏公也是重“豪放”而轻“婉约”的<sup>③</sup>。其实,多选豪放词乃是其时的风气和









词选得以出版的必要条件,换一个人也是会这样甄选的。不信,请看朱祖谋先生的传砚弟子龙榆生先生,他的新版《唐宋名家词选》(1962)所收苏、辛词的数量不也居所选诸家之冠吗(开明书店民国二十三年版收吴文英词最多)?检俞平伯先生的《唐宋词选释》(1962),亦复如是。二书皆与《宋词选》同年问世。


不过,先生在《宋词选》中也有坚持己见之处。如姜夔词,《词选》收9首,占1.7%,《宋词选》却收10首,占3.3%;周邦彦词,《词选》收13首,占2.4%,《宋词选》收10首,而比例却占3.3%;吴文英词,《词选》收7首,占1.3%,《宋词选》虽仅收4首,而比例却也占1.3%。可见先生在《宋词选》序中所说其选“是以苏轼、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作为骨干,重点选录南宋爱国词人的优秀作品,同时也照顾到其他风格流派的代表作,藉以窥见宋词丰富多彩的全貌”之言为真实不虚。其书的可贵正在这里。

至于此选的注释,尽管不可避免有一些疏误,却发挥了别的选本做不到的“广大教化主”作用,因为先生对选本注释所悬的标准至为严格,即:一、注释词句,首先是要求讲得通、讲得准确贴切,能够说明问题。二、注释词句不仅要讲得通,还要进一步发掘其真正意义之所在,避免简单化。三、征引词句的来源,取其语言艺术上具有相承相因、或者推陈出新的关系,不是说一般的习用词语,都必须找出它的根源<sup>④</sup>。深入浅出,繁简适中,这一切都甚便初学,无疑是此选能够风行海内,一印再印的原因所在。

正因为如此,作为先生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作,《宋词选》是有其积极意义的,至少它在那严酷的政治条件下,以“左”的言词为掩护,巧妙地向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普及了绚丽多彩的宋词。不能不承认,许多当代的词学专家,正是受此书启蒙而走上研究词学之路的。可惜其中有一些人如今已不肯原先生之心,反而“蠹生于桂而还食其桂”了。我真希望他们学一学作《非〈国语〉》的柳宗元,不一笔抹煞《国语》的好处,而能说出“参之《国语》以博其趣”那样的持平之论来。


综而述之,先生的词学思想孕育发展于多难之邦,以忧国之心,挥





谈词之塵，于前贤既有所继承，亦有所扬弃，既应和了当时的文艺思潮，又起了保存遗产不使湮灭的积极作用。其中虽不无偏激之处（如宣称“词体在百年前便死了”，反对现代人填词之类）<sup>⑤</sup>，却也绝不致如某些论者所说那样“容易贻误青年”。谁都明白，偏激之源别有所在，时代变迁，公论自见，旧有的过与不及自消。试看今日，年轻的诗词爱好者各就性之所近，于词或受豪放，或喜婉约，不见得是受了谁的贻误；词学研究者也各就己之所长，或论风格，或重体制，或微观着手，或宏观着眼，我用我法，卿用卿法，也并不曾受先生词学思想的束缚。倒是那些“人人自以为握灵蛇之珠，家家自以为抱荆山之玉”的予智自雄现象值得忧虑。毕竟，我们对前辈的学术成果应当抱尊重的态度，因为这些成果是他们生命所寄、心血所凝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，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，对胡雲翼先生的词学研究，我们正应作如是观。


下面再谈谈对先生诗学与文学史著作的看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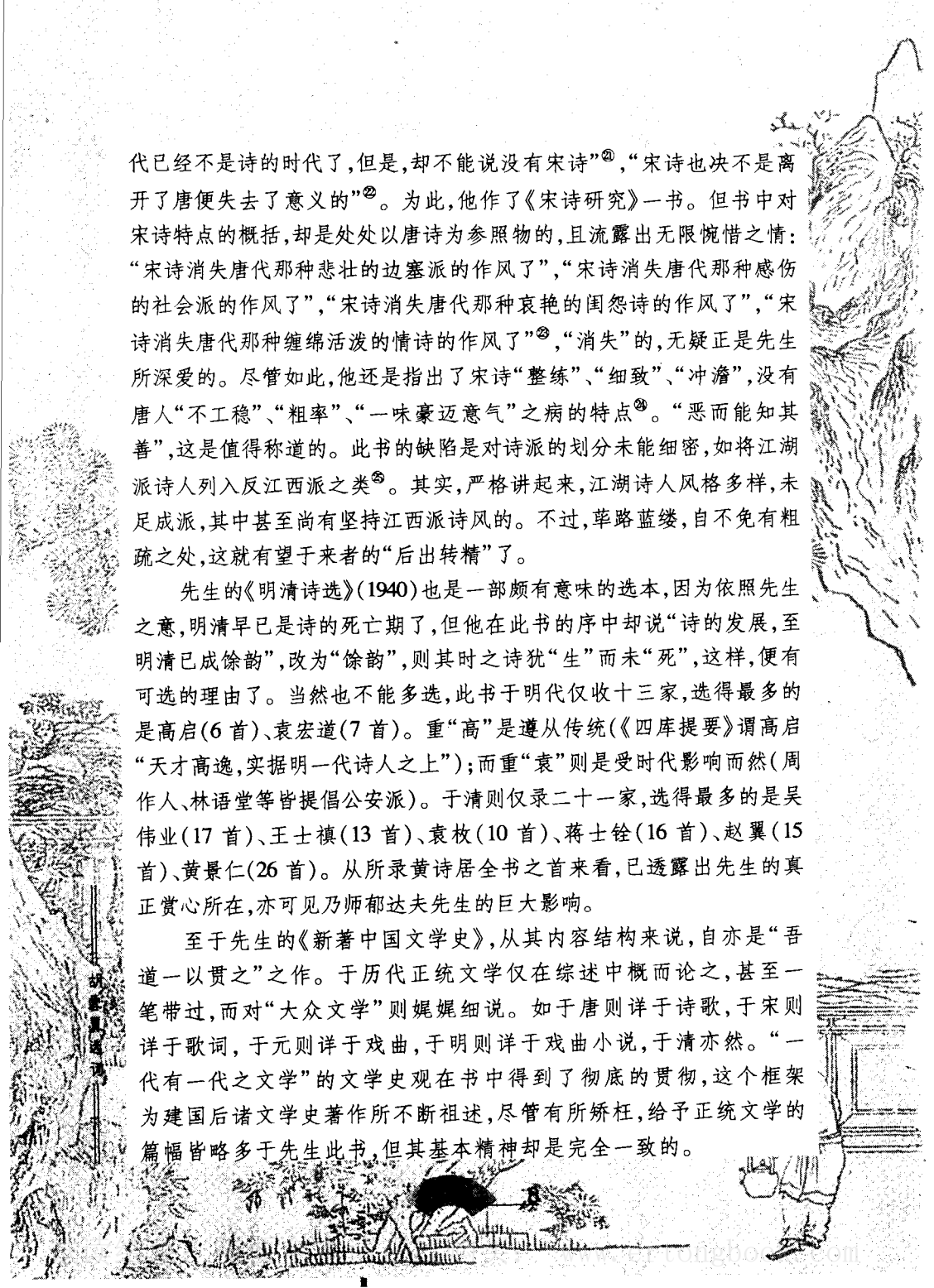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唐诗研究》是一部颇有见地的著作。先生纠正了流俗认为唐诗是最好、最盛的说法，指出“古诗如《古诗十九首》、《孔雀东南飞》，无论怎样丧心病狂的人，也不能不说是好诗，不能说其价值在唐诗之下”，《全唐诗》中，“实在有多少不是好诗，或竟不成诗”<sup>⑥</sup>。若以诗人数量而论，后世列朝也每每超过唐代<sup>⑦</sup>。唐诗的伟大乃在于“创造底”、“音乐底”、“通俗底”和“时代底”，这些特点都集中反映在新体诗上<sup>⑧</sup>。唐诗初盛中晚并不是由盛趋衰，而是各有佳处<sup>⑨</sup>。这些皆是持平之论。

先生论诗，持“文学进化”和“平民文学”两大基本观念<sup>⑩</sup>，这两大观念贯穿于先生所有的文学研究著作之中。细加考察，则先生所说的进化，是从全局的、通盘的意义上来看的，即文学创作，作为整体是进化的，而就每一种特定的文体而言，先生则认为发展至顶峰后又必然退化了，如先生所言今日旧诗词已是死文学之类的看法即是如此（至于先生潜意识中是否如此认为另当别论，因为先生还分明著有旧体诗集《废笔吟》），可见先生受“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”观点影响之深，而这一观点显然又是从“平民文学”这一观念生发出来的。

不过，先生将诗的消亡之期似乎定得较晚。他说，“理论上，宋





代已经不是诗的时代了,但是,却不能说没有宋诗”<sup>②</sup>,”宋诗也决不是离开了唐便失去了意义的”<sup>③</sup>。为此,他作了《宋诗研究》一书。但书中对宋诗特点的概括,却是处处以唐诗为参照物的,且流露出无限惋惜之情:“宋诗消失唐代那种悲壮的边塞派的作风了”,“宋诗消失唐代那种感伤的社会派的作风了”,“宋诗消失唐代那种哀艳的闺怨诗的作风了”,“宋诗消失唐代那种缠绵活泼的情诗的作风了”<sup>④</sup>,”消失”的,无疑正是先生所深爱的。尽管如此,他还是指出了宋诗“整练”、“细致”、“冲澹”,没有唐人“不工稳”、“粗率”、“一味豪迈意气”之病的特点<sup>⑤</sup>。“恶而能知其善”,这是值得称道的。此书的缺陷是对诗派的划分未能细密,如将江湖派诗人列入反江西派之类<sup>⑥</sup>。其实,严格讲起来,江湖诗人风格多样,未足成派,其中甚至尚有坚持江西派诗风的。不过,草路蓝缕,自不免有粗疏之处,这就有望于来者的“后出转精”了。

先生的《明清诗选》(1940)也是一部颇有意味的选本,因为依照先生之意,明清早已是诗的死亡期了,但他在此书的序中却说“诗的发展,至明清已成馀韵”,改为“馀韵”,则其时之诗犹“生”而未“死”,这样,便有可选的理由了。当然也不能多选,此书于明代仅收十三家,选得最多的是高启(6首)、袁宏道(7首)。重“高”是遵从传统(《四库提要》谓高启“天才高逸,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”);而重“袁”则是受时代影响而然(周作人、林语堂等皆提倡公安派)。于清则仅录二十一家,选得最多的是吴伟业(17首)、王士禛(13首)、袁枚(10首)、蒋士铨(16首)、赵翼(15首)、黄景仁(26首)。从所录黄诗居全书之首来看,已透露出先生的真正赏心所在,亦可见乃师郁达夫先生的巨大影响。

至于先生的《新著中国文学史》,从其内容结构来说,自亦是“吾道一以贯之”之作。于历代正统文学仅在综述中概而论之,甚至一笔带过,而对“大众文学”则娓娓细说。如于唐则详于诗歌,于宋则详于歌词,于元则详于戏曲,于明则详于戏曲小说,于清亦然。“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”的文学史观在书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,这个框架为建国后诸文学史著作所不断祖述,尽管有所矫枉,给予正统文学的篇幅皆略多于先生此书,但其基本精神却是完全一致的。